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919~1943)

王占仁○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919—1943）

王占仁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919 ~ 1943 / 王占仁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073-3024-3

I. ①共… II. ①王… III. ①共产国际—关系—中国共产党②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关系—中国共产党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国 IV. ①D27②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2534 号

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 (1919 ~ 1943)

著 者 / 王占仁

责任编辑 / 张文和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方方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700 × 1000mm 16 开 24.75 印张 300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978-7-5073-3024-3

定价: 50.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毛泽东对中国追求科学真理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路径的鲜明写照和精辟概括，是人们熟悉并得到广泛共识的至理名言。我们应深入思考，全面领会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启迪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诞生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此后，直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可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中共党史研究必须搞清楚的重要领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43）》系属这个领域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这个交叉的边缘性课题，长时期以来很少有人问津。这恐怕是同这两个领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密切相关的。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在改革开放前由于涉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是个“禁区”。改革开放后，中央高度重视，一度掀起研究热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冷落

了下来。直到今天，由于全新文献资料的翻译出版，学术界又掀起了几个“浪花”。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从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工作，一九八〇年三月至一九八二年七月，在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史编写工作期间，我深感要想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很多历史事实从根上说清楚，必须深入细致地研究共产国际、联共（布）“背景”及其与中共中央的关系。八十年代初，为了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人经请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后，组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廖盖隆任组长，我是六个成员之一。参与这个领导小组，对我深入研究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据我所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之所以要成立这样一个领导小组，主要是由于现实的需要。当时国际上批判苏联搞革命输出，西方学者同苏联展开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屡犯错误责任在于苏联，而苏联却说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他们搞论战，炮弹却落在中国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术界没有声音不行，而要有声音首先就要从研究入手，用学术成果来阐述和答复，才能有说服力和战斗力。当时研究这方面课题政治性和保密性很强，组织召开学术会议要带临时组织关系，最初召开的两次学术研讨会不公开、不宣传，研究成果不对外发表。在这个小组的组织领导下，研究工作逐步开放和开展起来，每年举办一次规模不大（五十至七十人）的学术年会。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积极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突破了长期以来的“禁区”，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第一个研究高峰，产生一批研究成果，一些高校还开设了课程，扩展了以往党史研究的领域，澄清了一些历史谜团，恢

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整体深入发展。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项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逐渐趋冷，一些高校国际共运史的课程不开了，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者也少了。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联解体了，加上党史研究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这个领域的政治性不再像以前那么强了。但是，从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仍然不失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可喜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直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引进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这批档案文献资料的编辑出版为深入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可贵资料，创造了极为有利的重要条件。不少学者充分运用这些新史料并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乏鲜为人知的史实，在整体趋向冷落的过程中掀起了几个“浪花”。我之所以把它说成是“浪花”，是因为现在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有些青黄不接，老的像我们这一代，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年轻的一代四五十岁的有一些，三十几岁的就很少了。以前我们从事研究时总是感觉文献资料不够用，现在的情况是大批原始材料翻译过来了，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对于这么有学术价值的问题，面临这样一个现实的境遇，令人担忧。所以当王占仁向我提出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很感兴趣并想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深入研究时，我便大力支持并全力帮助，这也促使我在过去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挖掘现在翻译出来的最新史料，重新思考和梳理这个问题。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当时能够收集到的共产国际、

联共（布）材料为基础，我撰写的《略论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①一文，阐述了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关系，改变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观点并为党史学界所接受。传统观点和学界一致认为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错误系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这篇文章在掌握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科学分析，认为两者不是两条对立路线，而是策略性质的分歧，主要是发动城市暴动的条件和时机是否成熟问题上的分歧，在这一点上李立三比共产国际走的更急。廖盖隆、胡华等著名党史学家都赞同这个观点。廖盖隆指出：“这是党史学界正确地说明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关系的第一篇文章。”^②胡华教授也认为“一般流传的印象是共产国际是反对立三路线的，是经过米夫、王明来纠正立三路线的。实际上，立三路线的产生，正是国际六大左的指导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当然，立三自己有所发展，且自拟了总暴动计划，这是国际所不同意的。”^③此后，我又陆续发表了有关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方面的系列研究文章。

关于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我曾在一九九三年发表了一篇《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效应》^④的研究论文。文章系统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遵义会议以后及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在对各个时期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进行全面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上

① 《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

② 廖盖隆手书《略论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学术鉴定表，1983年2月5日。

③ 胡华手书《略论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学术鉴定表，1983年2月2日。

④ 《东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

得出结论：总体上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起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双效”作用；作为中国革命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矛盾和曲折中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汲取其经验和有益思想，又逐渐摆脱其控制，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独立自主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就澄清了学术界存在的一些片面认识，如片面强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错误，而无视或否定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影响的一面。其实，历史地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不难看出，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在总体上是“双效”的，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有时二者同时并存。

当然，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不是一两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的大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我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在内容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包括思想理论和原著通过俄国传入中国；二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对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包括错误的和正确的两个方面；三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对毛泽东在领导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争中的贡献及其思想和主张的关注和评价，以及毛泽东对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态度，对马列经典著作的重视、学习和运用。在研究方法上，一是既要把此课题置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大背景下，还要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二是以历史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全面的

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与评价。如果按此方法评析，就会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来说是“双效应”，当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历史问题上有所不同，不宜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其次，不能由于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两条对立的路线而用形式逻辑加以推论，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既然是王明的后台就必然全盘否定毛泽东，或者是赞同毛泽东就必然否定王明。这些就是我在指导王占仁撰写《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43）》博士论文时的主要指导思想。从王占仁写成的论文和修改之后的书稿来看，基本上达到了这个预期目标。这本书通过深入细致地考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主体思想和支柱理论包括“一条道路”和“三个法宝”，即社会革命理论、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武装斗争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的关系，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共产国际、联共（布）继承、发展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深刻影响，深入地剖析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策略的关系，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国际条件和历史背景，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准确地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全书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综合阐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与理论价值，比较研究毛泽东与共产国际、联共（布）革命统一战线理论的异同，归纳总结“城市中心”与“农村中心”的三条判断标准，阐述毛泽东的“城市·农村”观，分析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关系等方面都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很有创新性。

在当今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了“显学”，大家都在以极高的热情探讨着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

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二级学科设置的时间还很短，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教学相当多的是原中共党史专业人员，他们在写文章或讲课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往往浮光掠影，一带而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根基不牢的问题，能够深入到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历史中去进行研究的成果更属鲜见。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而言，弄清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龙去脉是不可欠缺的。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分冷热，不能因为共产国际研究逐渐趋冷就忽略了它的学术价值。与此相反，这种一冷一热的结合，恰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中的冷思考。王占仁的书稿恰恰是这一思考的可贵成果，也算是这个领域研究趋向冷落过程中的一个“浪花”吧！这本书是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但愿能够得到国内外学术同仁的认可并给以指正，就算是对一个年轻学者最好的鼓励吧！

是为序。

郑佐荣

二〇一〇年三月

目 录

序	郑德荣
绪 论	1
一、研究现状与意义	1
二、主要内容与创新	13
三、相关概念界定	24
 第一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基本问题	29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宣传 ...	29
（一）关于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30
（二）关于发展和推广马克思主义	34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	39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47
（一）关于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	
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47
（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革命	
基本问题的初步探索	51
（三）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	56
（四）关于意识形态的同宗同源与革命利益之争	60

（五）关于遵义会议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62
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	66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67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68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70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72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	73
（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75
（七）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	77
（八）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反倾向性斗争 ...	78
第二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社会革命理论中国化	81
一、列宁主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影响	81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思想	82
（二）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思想 ...	84
（三）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	88
（四）关于东方革命历史特点的思想	91
（五）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思想	92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95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	
三次“左”倾错误	103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三次	
“左”倾错误的总体评价	103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三次	
“左”倾错误的制度根源	111
（三）三次“左”倾错误的思想方法问题	115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与理论价值	119

(一)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	120
(二) “五个道路”的关系辨析	123
(三)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价值	128
 第三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	133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两次国共合作	133
(一)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	133
(二)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两次右倾错误	141
(三)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两次国共合作的评价	149
二、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左”倾关门主义	158
(一) 中俄革命的简单类比与“三阶段论”	158
(二) “左”倾关门主义的主要表现与危害	164
(三) “左”倾关门主义的终结与反思	172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比较研究	177
(一) 关于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79
(二) 关于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180
(三) 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	182
(四) 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185
(五) 关于对待各派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基本原则	187
 第四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武装斗争理论中国化	190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第三时期”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的进攻路线	190

（一）两种截然不同的“第三时期”理论	190
（二）两个不断升级的军事进攻路线	194
（三）“第三时期”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军事 进攻路线的终结	202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 革命道路上的城市中心论	206
（一）“城市中心”与“农村中心”的判断标准	206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城市中心论	209
（三）毛泽东对城市中心论的批判与反思	218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农村包围城市 道路理论的形成	222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对武装 斗争的认识	222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农村包围 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	228
（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理论价值	233
第五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化	237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原则与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	237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建党的基本原理	237
（二）列宁的完整建党学说	240
（三）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根基	246
二、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方针与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248
（一）从“唯成份论”到思想建党	252
（二）从教条主义到三大作风建设	255
（三）从偏重集中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259

(四) 从宗派主义到“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	262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	
建设的基本经验	264
(一) 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267
(二) 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根本的首要任务	273
(三) 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278

第六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83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领导	
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	283
(一)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	
面临来自党内的严峻挑战	284
(二) 共产国际在毛泽东战胜张国焘右倾	
分裂主义错误中的作用	285
(三) 共产国际在毛泽东战胜王明右倾	
投降主义错误中的作用	290
(四) 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	294
二、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	
实践的双向互动	301
(一) 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302
(二) 中国革命实践经验需要升华为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307
(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	311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	315
(一) 要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和卓越领导人来	
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理论基础	316
（二）要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紧密结合，这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317
（三）要在实践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修正错误，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319
（四）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321
（五）要反对教条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主要历史特点	323
（六）要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高境界	325
 第七章 毛泽东论共产国际	 330
一、关于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	330
二、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334
三、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37
四、宝贵的历史启迪	340
 参考文献	 343
后 记	379

绪 论

一、研究现状与意义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研究历史离不开第一手资料。恩格斯说过，真理就是用事实本身说话。作为历史发展过程来龙去脉真实记载的原始档案，在历史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凭证功能和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最珍贵的历史记录。正因如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是与相关文献的翻译和出版相伴生的。总体上来看，这一课题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研究高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研究逐渐趋冷，高校国际共运史的课程不开了，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者也少了。在九十年代后期由于新史料的公布，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在整体趋向冷落的过程中掀起了几个“浪花”。

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余年间，虽然不能说没有研究，但学术界的成果确属鲜见，这主要是考虑中苏关系，实际上是个禁区，加之文献资料既少又保密所致。改革开放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胡乔木、胡绳、廖盖隆等老一辈党史研究者曾经一再指示要重视和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并身体力行地投入这项工作，推动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奠定了研究的框架。这在当时主要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当时国际上批判苏联搞革命输出，西方学者同苏联展开了关于中国